

【学人专访】

碑铭与外语档案研究 庄钦永博士专访*

**An Interview with Dr. David Chng Khin Yong
Research Studies on Inscriptions and Foreign Language Archives**

黄欣怡*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

Ooi Sing Ee
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 Malaysia
Email: ooisingee@uitm.edu.my

Published online: 26 APRIL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Sing Ee, O. (2024). 碑铭与外语档案研究 庄钦永博士专访*: An Interview with Dr. David Chng Khin Yong Research Studies on Inscriptions and Foreign Language Archives.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5(1), 68–86.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1.4.20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1.4.2024>

摘要

近年来，利用碑刻资料如神主牌、碑记及墓碑文字已成为星马学术界普遍的治学方法，外语档案则依然较少为学者使用。阅读外语档案考验一名学者坐冷板凳的毅力，并非简单的差事。尽管庄钦永使用外语档案开拓星马华人史研究的新路径，写下不少具有新见的学术成绩，然这份耗尽时间、心力与经费的工作，似乎难以吸引年轻学人追随。专访缘起于笔者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向庄钦永先生请教伦敦布道会与美部会传教士档案。相较于星马两地学者在情感上对传教士及其研究排斥，在方法上依旧围绕在已被使用殆尽的中文史料撰写华人史议题；庄

* 本专访内容整理自笔者两次对庄钦永先生的请教与专访，第一次会面日期是 2023 年 3 月 7 日于新加坡百胜楼一家茶餐室；第二次则与魏月萍老师于 2024 年 4 月 6 日在庄钦永先生住家进行访谈。访谈内容经庄先生检查、修饰。

*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学程博士生、森美兰玛拉工艺大学讲师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Cawang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钦永利用外语档案开拓新加坡华人史、教育史、甲必丹等研究的新路径，让人耳目一新。《新加坡华人史论丛》等著作是庄钦永早期利用碑记资料与外语档案等材料考证的成果；后期则专注于传教士研究，跨足在基督教史、汉语新词和翻译史。采访详述庄钦永在澳洲国立大学利用科技作为历史研究工具、在新甲剔藓寻碑的艰辛历程及多次到国外查阅档案的经验，其所展现丰硕的成果，冀可鼓舞年轻学人善用原始档案在各自领域有所拓展。

关键词：碑铭、外语档案、新甲华人史、传教士研究、翻译史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scribed materials have become commonly used in the academic fields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while foreign language archives remain less utilized by scholars. Even though Dr. Chng has pioneered new paths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history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by using foreign archives and has produced many groundbreak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is approach struggles to attract younger scholars due to the time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required. My interview with Dr. Chng stemmed from my doctoral research, seeking his expertise on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nd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rchives. Unlike scholars who predominantly rely on exhausted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Dr. Chng's use of foreign archives has opened new path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Singapore,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Kapitan studies. His works as "*Collected Essays on Chinese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reflect his early successes in archival research. Later, he delved into missionary studies, Christianity history, new Chinese words,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The interview highlights Dr. Chng's academic journey, starting from his use of technology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o the arduous process of searching for inscriptions in cemeteries and repeated visits to foreign countries for archival research. These fruitful experiences are intended to inspire young scholars to effectively utilize primary sources to expand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Keywords: Inscriptions, foreign language archives, Chinese history of Singapore and Malacca, missionary studies, history of translation



(图：2024年4月6日摄于庄钦永先生住家)

庄钦永博士简介

1949年出生于新加坡。1971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系，后负笈澳洲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简称 ANU)，1977年获文学（亚洲研究）硕士学位。先后任职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1981年前往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修读图书馆学一年。早年研究兴趣为马六甲、新加坡华人史，素有“碑文研究者”以及“碑铭专家”的美誉。

1996年自政府部门退休后，担任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副研究员。2006年取得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担任研究员，至2009年离职。2013年至今，担任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兼任研究员。现专治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中文出版业、汉语新词与晚清翻译史。著有《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及《万国地理全集校注》等著作。

引言

四月份的第一个周六，新加坡天气晴朗多云，公园里的黄金雨树开得正茂。75岁的庄钦永像以往一样早起，早上8点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拿起红笔继续在昨日翻阅至一半的书本做笔记。这是他一天工作的开始。中午吃了午饭打盹休息，起来后工作至傍晚6点。用过晚餐，和太太到公园散步。晚上回到家，太太在客厅打开电视看新闻，他又坐在书桌前读写一个钟头，约至10点息灯，结束规律生活的一天。近来早晨他不马上开始工作，而是先到公园晨运，活动一下手脚，预防关节退化。每个星期有一天早上，他会和朋友一起游泳，然后一起吃午餐聊天，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社交生活。庄钦永说他必须小心照顾自己，领着公务员医药福利的他，嘴上常挂着“我要比太太多活一天”的坚定。

庄钦永日常时间抓得很紧，不看报纸。“到底我只是一个书生，对政治也没兴趣。”百姓对政治不满是家常，情绪随着动荡局势波动，过着隐居生活的他甚至拒绝这不必要的情绪干扰。他说学者有两种，他是倾向于饶宗颐的行事作风，不问时事；余英时是偶尔也要谈时事。“我这样讲不是说我可以跟饶宗颐攀比，我只是比较喜欢平心静气地做学问，全心全意地钻研。”由此，他只给好朋友与学术界几位谈得来的同道电邮及电话，免得太多干扰。这是庄先生特别难找的原因。早前从魏月萍老师那里拿到的电邮邮址发不出去，经过半载好不容易联系上，我们约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晤面。庄先生提前半小时抵达，我后头跟上，上半身亮眼的朱红色 Polo T 恤是为方便我认出他而穿。我当然不需要从穿着就认得颇负盛名但依然生活低调得很的前辈学者，向前和他打了招呼，随后他说：“我不随便出来见人，因为你是通过昭智¹找到我，所以我才没有推辞。”一番耿直吓得我不得不躬起身来，不敢轻易抖落从马六甲带过来的喜悦与紧张。

庄先生领我到一家坐落在百胜楼角落间的茶餐室，谈话间他又忍不住说：“你喝一个下午茶，时间就过去了。”早在电邮联系之际，他已事先说明较为合适的会面时间，因为这月份之后他得专注赶论文与书稿。有关当天新加坡关卡交通状况、茶餐室环境是否方便聊天，以及我请教的问题他是否能很好的分享与对我有帮助，也给予详细说明，深怕我白跑一趟。想来这是一种老辈学人双向的礼貌，拒绝书写时间被耽搁的同时，也不耽误他人的时间。第二次会面，庄先生依旧提前到了捷运站接我们，我们同他步行到花园住家。“早上头脑比较清醒，有时谈到什么问题，我一时想不起来，可随身翻查书架上的资料”，都是当天采访时间与地点的细心考量。

¹在此感谢马六甲书法家沂水阁曾昭智先生引荐。

一、东汉安帝灾异现象研究与科学方法

庄钦永的学术起步，要从南洋大学毕业后，负笈澳洲国立大学谈起。如果我们说大概近十年来中文学术界才开始有人利用科技进入古典文学，1970年代庄钦永在澳洲国立大学亚洲学院撰写硕士论文，即已借用天文台推算《后汉书》记载东汉安帝时期的天象。乍听之下，我们都有一种哗然，原来那么早，尤其在那个论文还需另雇人打字的环境条件，就有人利用科技作为历史研究工具，由此，1977年硕士论文谢词，除了感谢两位指导教授——柳存仁（1917-2009）和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 1935-），他还特别感谢坎贝拉斯壮罗山天文台（Mount Stromlo Observatory）Mr. H. Abraham对他天文学研究提出的专业意见。

“我们很少会想到，可以用现在的科学方法推算《后汉书》记载的各种灾异现象。我整理好一份《后汉书》记载的日蚀、月蚀日期，交给天文台研究员，请他们推算在公元某一年某一日，在洛阳有没有出现日、月蚀。若《后汉书》记载有，但天文台推算出来没有的话，那就可以写文章。这是天象与政治问题，好比罗马帝国，官员不可直接骂皇帝，只能用天象给予警示宦官专权，或者皇帝做得不对。借助天文台的计算，他们甚至可以很准确地推算《诗经》的日、月蚀发生在哪一天。”

这篇学位论文以中国传统考古学的考证为主，结合西方科学方法，历史考证更为细致。前者是负笈澳洲前，为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历史，自发购买以英文撰写的考古学、古文字学书刊，努力研读打下的扎实基础。出国后虽未如愿向慕名的巴纳教授（Noel Barnard, 1922-2016）专研古文字学问题，却有益于汉史研究；后者则在西方知识园地获得一条开拓研究的新路径，尤其深受汉学家张磊夫教授与柳存仁教授的影响。论文构思依循瑞典汉学家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 1920-2015）与德裔美籍汉学家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对汉朝灾异现象的科学检视路径。论文开头首先引述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 1905-1963）对中国传统史学刻板印象的批评：“中国历史学往往缺乏历史学家个人诠释，他们更倾向于对观察到的事实整理概括。”²西方历史学则从历史学家个人观点出发，这是两者最大不同的地方。

²“As Etienne Balazs, has well pointed out, one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its stereotype: the sense that it lacks of historian’s personal touch and his generalisation of observed facts.” Chng, K. Y., *Portents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An (106-125)*. M.A (Asian Studies)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7, p.1.

近十年来，台湾学者简锦松（1954-）用 GPS、GIS 解读古籍原典，南京大学周英忠用 GPS 研究古书的地名。“这是近年来才有人用科技进入古书，不过西方学术界很早就用科学方法测量天文现象。中国有一个学者抄美国学者的东西，后来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指出这是掠人之美。即便当时中国有科技，但利用天文科技逆推二几千年前日蚀发生日期，还是相对较晚的事情。我在 ANU 最主要是学习新方法，学习外国汉学家怎么看历史。”

除了撰写论文方法上的训练与眼界的打开，柳存仁老师撰写论文基本原则的嘱咐，也使庄钦永牢记与实践。“柳存仁老师常常跟我说，你写东西要写人家没写过的，要写一个全新的题目。”由此，他严格的要求自己，“即便是一篇短小的论文，我也要求自己有新的材料和新的看法才写，人家写过的题目多我一篇没什么，写文章要有突破，这样才能够替学术做出一点贡献。”

两位老师年纪大了，还在做笔记写书，亦让庄钦永有很大的感发。“我这两位老师很了不起。张磊夫 80 多岁还在写书，他的《洛阳大火》，³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替他出中译本。研究小说与道教关系的柳存仁老师，年近 90 岁，我到坎贝拉去探望他的时候，还在做《道藏》的笔记。我接触的这些老前辈才是真正的学者，一辈子都在做研究。陈铁凡病痛还继续做学问，都给我很大的感触。这种所谓的傻子，在学术界是很少看到的。基本上我接触的学者都给我很大的鼓励，这决定了我这辈子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学术明星还是要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学者。”庄钦永感慨学术界有一些学术明星，这在丁荷生（Kenneth Dean, 1956-）书序文⁴有提到：“其实我是有感触而写的，里头有一句‘不居虚位，一曲吹江湖’。一些学术里的人是不做学问的，一辈子就是一本书，开始我是写‘一曲吹天下’。有学问吹天下还不错，后来改作‘一曲吹江湖’。”

带着上穷碧落下墓园寻找新材料的觉悟，庄钦永自澳洲国立大学毕业后，依旧申请政府部门的职位。他说他的考量其实很简单，在政府部门就职，申请假期不用看老板脸色，这是职员的权利与自由。他逗笑地说：“在私人界的话，你说要申请去英国看档案，肯定炒你鱿鱼了。”刚加入政府部门，一年有 28 天假期，工作 10 年后增加至 39 天假期。“一年 39 天假期，不包括拜六礼拜，很好用。我

³张磊夫著、邹秋筠译，《洛阳大火：公元 23-220 年的后汉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⁴庄钦永在丁荷生，许源泰合编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新加坡：新加坡国大出版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写了一篇序文，少见地对学术现象给予肺腑的批评：“为学之道，切忌游惰与心志纷张。学者有三绝：一、绝不攀附权贵，做无谓酬应，捧足献浅，有褻笔墨；二、学术乃千秋之业，绝不与空学虫豸之辈争一日之胜，浪掷时光；三、绝不贪图虚名高位，终生不学，一曲吹江湖。如此，学人始能摒绝尘氛，平居兀坐，心净意专，全心钻研。有此三绝，学人尚须是‘傻’人一介。”（页 xiii）

可以到马六甲做田野调查和到英国阅读档案。”记第一天到国家图书馆报到时，行政人员说，职员都愿意减少假期，把 14 天的假期换作薪金，每月多取 50 元。“我说，我不要钱，我要假期，”她很难理解。在 1970 年代，50 块钱是很大的，当时大学毕业生月薪是 465 元。我其实是用钱去买时间，正因为未能进入大学工作，想利用这些假期做一点研究，可以完成我的一点心愿。”

随即，我们在马六甲三宝山看见他单薄的身影在烈日下剔藓寻碑。

二、用墓碑还原华人名字

1980 年代，继饶宗颐（1917-2018）《星马华人碑系年》⁵及陈荆和（1917-1995）、陈育崧（1903-1984）合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⁶后，傅吾康（1912-2007）和陈铁凡（1912-1992）共同编著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⁷三卷本陆续出版。庄钦永回想他冒起抄录墓碑文字的想法，正是在阅读傅、陈两位教授著作后的初步构想。“1983 年，两位教授所编著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出版，由于我在坊间买不到此书，于是，我特地到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购买一册。回家后，详细翻阅该书，对其内容之丰富精彩，校对之细心，深感佩服。对两位学者为保存这批珍贵史料所付出之时间与心血，更是敬佩不已。1984 年，我有个构想，那就是在《铭刻萃编》之基础上，再做一些田野调查工作。”⁸以金石为载体的碑刻文字可补文献不足或纠正其错误的意识，亦源自于庄钦永撰写硕士论文时，取汉碑文字与官方记录比读，时有新发现。⁹庄钦永集中在收集马六甲墓碑，主要是其他碑刻资料像是庙宇及会馆碑记，前人大概都已收齐了。

“那时没有人注意墓碑这块东西，我自己做，太太很担心。我花钱住进旅馆，包租计程车到三宝山和野外坟场，杂草很高，打雷没有地方躲，又怕踩到蛇，更何况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可能去年看过的一个碑，下一年再来找，找了老半天才找到，多么高兴。后来我放掉这个研究，把粉笔全部丢掉，我太太很高

⁵《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⁶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

⁷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 1-3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1987）。

⁸庄钦永，《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民族学研究所资料汇编》第 12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8），自序。

⁹庄钦永，《“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我走过的道路（1971-2022）》，《学文》第 24 期（2023/2），页 127。

兴。我很佩服她，虽然她不太赞同我的工作，但她不会阻止我完成我想做的事。”

那是我们难以想象与理解的困境，由此当有个年轻学人发电邮向庄钦永请教，文章开头却说“庄先生收的东西太少，我现在来补充，”让他心里难免不舒服。“我们那个时代没有数码相机，当时是从黑白转成彩色照相的时期。我不能够用彩色拍，contrast 不到，黑不是很黑，白不是很白，所以我必须用黑白，但是黑白冲洗很贵。你想看一天冲洗费要花多少钱，我不可能一天拍一百张，只能选择性来拍。面向马六甲海峡的都是乾隆时期的墓碑，我看到就拍下。现在我一天可以拍三四百张，回去再慢慢挑选。你必须了解我那年代的困境才来讲这句话。加上那个时候，没有人支持我。”

若将庄钦永钞录墓碑的工作与前辈及后继学者对比，可理解他所说的“没有人支持我”的学术环境条件。相较于傅吾康与陈铁凡（四个研究助理协助）、陈荆和与陈育崧（陈荆和在序文中说田野工作大多由李业霖负责，两位同学帮助钞写和校对）、王文斌《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¹⁰（由多名学生与研究助理长期参与工作，并获得政府特别拨款）、丁荷生与许源泰合编《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由新加坡国大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均有研究团队、大学出版社与各种资金来源赞助；庄钦永在时间、人力及经费欠缺的条件下，独立完成艰辛的工作。期间就他所发现的一些重要墓石，在周末与轮值夜班的零碎时间，撰写笔记式的短文数篇。《马六甲、新加坡碑文辑录》专书出版，则要待到 1996 年，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顾问郭振羽老师推荐他担任该中心的副研究员，他才能专心整理 13 年来搜集到的马六甲墓碑资料与后继寻找的新加坡墓碑及神主牌，1998 年由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出版。¹¹

地下材料如何补充纸上文字？庄钦永说，最主要是还原华人名字。研究新加坡华人史，离不开宋旺相（1871-1941）经典学术著作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¹²该书 1923 年由马来亚大学出版社刊行，直至 1993 年才出版《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译本，¹³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陈共存统筹，叶书德译，林孝胜、庄钦永、张清江、李发沈校订。庄钦永多年墓碑钞录的工作经验，解决了英文著作翻译中文名字的难题。“很简单的，研究华人史唯一一本宋旺相的百年史，但不知道华人的名字，必须得靠碑铭来补充。宋旺相那

¹⁰黄文斌，《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3）。

¹¹庄钦永，《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自序。

¹²Song, O. S.,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Malaya Press, 1967.

¹³宋旺相著、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

本书，他们请一个中国学者翻译。后来陈共存将书稿交给林孝胜校对，林孝胜拿给我们，一看之下人名翻译都是错的。翻译者没有看过新加坡碑文，他是按照英文名字音译。我跟他修正，按照碑铭还原。”

庄钦永另举一个例子说明：“早前我在英国看档案发现了马六甲甲必丹 Chan Jamqua，回来隔了一年我写了一千字，我说他应该是曾应菊。后来几年前青云亭发现两块雍正初年的木牌，¹⁴发觉名字不对，是曾应葵。外语档案很多都是用汉语拼音拼写的名字，真正的华人名字必须靠碑文来还原。”除了对新加坡华人名字的还原，庄钦永说他另一个贡献是用碑铭校对陈育嵩《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集录》很多错误的地方，我真的很详细地一个一个校对、修正过来。这种校讎工作非常花时间，有时要花两个钟头才能将一块碑铭文字校好。¹⁵大概是这种严谨校正的态度，阅读庄先生的文章经常发现他心细的地方。当大部分学者相互转引资料而不察内容或名字有误时，他总能目光犀利地把细小的错误校正过来。

碑铭如何推进星马华人史研究？庄钦永常举的例子是麦留芳及其方言群研究。“麦留芳从碑文看不同社群的捐款与帮派的关系，开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他有一本很著名的书 *The Dynamic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 in Early Malaya*，¹⁶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替他出版，还有一本是《方言群认同》，¹⁷从社会学视角诠释星马华人社会帮权问题。”庄钦永则利用神主牌结合英殖民档案，搭建起新华会党与华社的关系史，撰写《实叻峨槽五虎祠义士新义》，¹⁸1996年由南洋学会出版。

三、甲必丹新探与英国档案

庄钦永前脚方才跋涉坟场，后脚则紧赴外国看档案资料。“在研究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课题时，学者大都利用青云亭中的碑刻资料（如神主牌、碑记等）及墓碑文字。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历史学家挖掘出来的中文史料利用殆尽，如果在这个课题研究上要有突破，就应该使用外语档案文献，结合碑铭资料及先贤时人的研究成果。”¹⁹上文提及甲必丹曾应葵，是庄钦永继三十年前搜集到的资料写就的

¹⁴庄钦永，〈记马六甲青云亭刚发现的两块雍正初年的木牌〉，张禹东、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页27-52。

¹⁵庄钦永，〈《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校讎记〉，《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页191。

¹⁶Mak, L.F.,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5.

¹⁷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

¹⁸庄钦永，《实叻峨槽五虎祠义士新义》（新加坡：南洋学会，1996）。

¹⁹庄钦永，〈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曾应葵：一个被历史遗忘了三个世纪的人物〉，《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8-19期（2016），页4。

一篇短文的扩展，结合了英国档案与青云亭木牌的新发现。“我很满意曾应葵那篇论文，那是三十年后才写成，我年轻的时候，读书少，写不出这样的东西。”马六甲甲必丹和英国港脚商人发生关系的构想，启发自他惯常的阅读经验，在即有的中文著作之外，寻找印度洋航海与贸易方面的英文论著来读。1985年，他代表国家图书馆到英、法两国寻找中文书刊，随即在伦敦大学附近一间高四五层楼的书店，购买了刚由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查胡利教授（K. N. Chaudhuri, 1934-）撰著的《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自伊斯兰教的兴起至1970年的经济史》（*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²⁰

“到英国工作两个半月，那时没有手提电脑，也没有电邮。单身只影，长时间居住在外国旅馆，晚上没事，惟有看书解闷。那年头，我对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这一课题有兴趣。晚上无事就捧着查胡利教授新著啃读，就此对这领域有些基本认识，回到新加坡后，业余时间，我开始找这方面的英文论著来读。有一天，我读了一篇论文，作者据《约翰·史卡特古德档案》说，1714年至1722年间印度东部马德拉斯的英国港脚商人约翰·史卡特古德（John Scattergood, 1681-1723）与马六甲华人甲必丹 Chan Jamqua 有贸易关系。读后兴奋不已。”庄钦永原有意到公共档案馆翻查原件，因假期结束返新。后因工作忙碌，直至三十年后的2016年，再次找出当年所抄录的资料，又另从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出 Chan Jamqua 亲笔签名的多个文件。庄钦永写就这篇文章时说，“这是目前我们所发现马六甲华人甲必丹中留存于世的纸质文献，是马六甲华人史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说来掷地有声，并不虚张。尽管庄钦永利用外国档案丰富了星马华人史的研究成果，然这份耗尽时间及体力的不讨好工作，似乎难引起年轻学人跟随。以曾应葵这篇文章来说，庄钦永三十年前依据在大英图书馆发现的约翰·史卡特古德手稿写成一千字一小节的文章，²¹三十年后又由他自己完善了这篇论文，期间没有吸引对甲必丹有兴趣的相关学者从他寻获的线索进一步探询。²²

看外语档案除了考验学者坐冷板凳的耐力，也很讲究经济财力。庄钦永说他在钱财这方面看得很开，尤其常笑称自己是败家子。“老实讲我舍得花钱到外国

²⁰Chaudhuri, K. N.,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²¹庄钦永，〈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新探〉，《新加坡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页9-16。

²²另一方面，年轻学者阮湧洵（1986-）大量使用族谱补遗甲必丹生平事迹，扩充该议题的研究面向，庄钦永对他严谨治学与功力颇为赞赏。详见庄钦永，〈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曾应葵：一个被历史遗忘了三个世纪的人物〉，页3。阮湧洵的论文可参考〈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李为经生平事迹补遗一一以《厦门光裕堂李氏族谱》为依据〉，《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4卷第1期（2015年6月），页59-70、〈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曾其禄与曾应葵生平事迹补遗〉，《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25期（2020），页65-89。

看档案，是败家子。我觉得要是不看这些资料，就没办法突破目前的研究，钱我必须花，我年轻的时候对钱财看得很淡才会这样做，普通人大概不会。现在环境改变了，很多档案资料已数码化，在数码化以前，我们必须亲自出国看。”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前几年采访他，为专访打了个灿烂夺目的标题：“自掏腰包做研究，不枉此生。”²³那是一件他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辈子喜欢做的。回到现实层面考量，庄钦永也不否认，新加坡经济条件好是一种优势，中国学者若要把人民币换到英镑到外考察，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我们必须理解别人的地方。

四、传教会档案与基督教史

1990年，庄钦永就他田野调查与外国查阅档案的经验，写了〈关于十九世纪新华社会史的一些原始资料〉。²⁴在这批资料中，相较于海峡殖民地档案、碑铭与报章资料，伦敦布道会档案最吸睛，也是最少学者留意到的。他利用这批档案——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 *LMS*）和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简称 *ABCFM*）档案进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博士论文探讨十九世纪上半叶马六甲、新加坡传教士中文印刷出版史。²⁵

“我之所以进入传教史研究领域，因为当时没有人做这块。*LMS*是在70年代末才将它的档案交给伦敦大学，*ABCFM*也是很迟才交给哈佛大学。”庄钦永2006年才来写这个题目，但其实他很早就知道传教士在新加坡、马六甲和耶加达刊行大量中文书刊，是在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 Publication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²⁶看到的书目，该本著作现有中译本《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²⁷未待说完，庄钦永马上从邻近的书架取出这两本书，泛黄的英文原著贴满黄色便利签。

²³张曦娜，〈自掏腰包做研究——庄钦永：不枉此生〉，《联合早报》（2020年2月24日）。

²⁴庄钦永，〈关于十九世纪新华社会史的一些原始资料〉，《新加坡华人史新考》，页165-176。

²⁵庄钦永，《神州域外西湖暗流：十九世纪上半叶马六甲新加坡中文出版初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博士论文，2006）。

²⁶Wylie, A.,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 Publication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1867)*.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²⁷伟烈亚力著、倪文君译，《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985年，当国家图书馆馆长让他到英、法两国寻找1965年前在新加坡出版的书刊，用以填补东南亚藏书室的大缺口。到了英国，才发现这批书刊藏在大英图书馆、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图书馆，有一部分是英国没有的，则藏在哈佛大学。“不过那时候工作太忙了，我也没有真正去挖掘档案。”90年代庄钦永才开始踏入这项研究。“刚开始去伦敦大学看LMS原件档案，原件容易看得多，用microfiche看的话背面的字会渗透到前页来。后来我还去哈佛大学当研究学者三个月。”

谈到传教士整体的研究状况，庄钦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哈佛大学学者首先开始研究美国传教士，比利时有一间著名大学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天主教和耶稣会，研究得很深入。中国学者很迟才进入这领域，在中文学术圈来说他算是很早的。“苏精说我80年代就开始投入，他算是比较迟一点才进入这个研究领域。”²⁸至于新加坡的传教士研究状况，庄钦永说很少学者投入。对新加坡人来说，相对佛教作为主流的学科，传教士是边缘的学科，一般人不太愿意进入这个领域；再加上有些人因鸦片战争对华的伤害而对传教士持有偏见。“我可以理解这种偏见，无可否认鸦片战争是西方侵华犯下的历史错误，这点不需要狡辩。当时报读博士学位时，我对郭振羽老师说我要做传教士研究，你不能接受我就不念了，因为我是纯粹从学术来看，不是护教式的。基本上中国大陆学者研究传教士，都不是基督徒。从学术来看，传教士是很重要的研究议题。”

传教士无论对当地医疗或教育都有建树，但似乎没有什么人开展。可能中文的论述比较少，我们请教庄生英文著作有吗？他说英文论述很多是西方学者在做。那在华人圈子的对话对象是……？他立即笑说“没有对话对象！我时常出席外国的基督教史学术会议，他们提议下一年由新加坡来主办，我说我演独角戏很难。不过最近我听说新加坡国大好像改变了，他们会请学者来演讲传教士与基督教课题。我说这个很难得，以前传教士的东西都排在学术圈外。”甚至于早期庄钦永请新加坡国大图书馆购买传教士档案，过程亦波折。“他们大概是不要买，后来他们说你请历史系的教员签个名，证明档案有使用率才买。我跟图书馆负责人说，校外研究人员走在学术的前沿，知道哪些文献重要，你应该接受。我们在ANU读书，需要用到哪些档案，图书馆都跟我们买。受条约所限，职员不敢越界，而且购买档案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国大图书馆改变了，我推荐的图书，他们都购买。这是很好的改变，值得赞许。”庄钦永在三一神学院那两年曾替该院图书馆购买不少基督教及新教传教士研究、鸦片战争等档案图书资料。“那他们有

²⁸苏精2010年出版《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他在该著作说，目前只有庄钦永使用英美档案文献(页173)。

没有比较重点去培育年轻学者，或有一个研究团队，鼓励年轻学者慢慢把传教士各方面做起来？”庄钦永说很难，“以前有一个女职员跟我提过，教她誊录一些档案，但是他们很难持久。看档案是你要坐冷板凳，要有毅力，对一般人来说都不太容易。可能有封信你看了三天后，发现没有什么用处，但必须接受这样的徒劳无获。”

“写论文要突破，只能看档案，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末。比如说新加坡有一个年轻人陈鸿毅（Joshua Tan）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南大史，他利用档案查看冷战时期美国怎么利用星马民间团体来控制和对付共产党。”²⁹另，庄钦永在查阅传教士档案时发现不少有关星马新村的报告。“我最近跟陈丁辉说，新村有很多传教士档案。传教士在新村展开宣教工作，他们必须向总部报告这里的传教进展。我叫他去看，新村研究也就更全面。”由此庄钦永总结，“学术研究不可以对宗教有偏见，你可以不看他传教的东西，但他们详细的报告对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很有帮助，尤其中文资料那么少。”

在台湾学术界，则有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李爽学（1956-），集中在天主教研究与基督教文学翻译。庄钦永说：“李爽学写的东西很棒。我最佩服是他写‘龙’这个翻译，龙是马礼逊第一个发明出来，但这是错的，我们现在还沿用这个错误的译词。西方的 dragon 是恶兽，中国的龙是祥瑞。”³⁰

五、郭实猎笔下的“大英”与鸦片战争档案原件

在传教士中文书刊出版史，庄钦永留意到了一个人物——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成为他基督教史研究的核心人物。先后出版了《“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³¹与郭实猎编译《万国地理全集校注》³²，并将该议题进一步扩充至词汇学与翻译史，《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³³是2022年出版的新著。

²⁹ 陈鸿毅博士论文题目为“*Schooling Free Asia: Diasporic Chinese and Educational Activism in the Transpacific Cold War*”。参考自加大网页：<https://humanities.ucsc.edu/academics/faculty/index.php?uid=hotan>，浏览日期：2024年6月5日。

³⁰ 李爽学，〈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我所知道的“龙”字欧译始末〉，《汉学研究通讯》第26卷第4期（2007年11月），页1-11。这篇文章后来收入氏著《明清西学六论》（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页279-309。感谢庄钦永先生提供这条资料。

³¹ 庄钦永编著，《“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2015）。

³² 【普鲁士】郭实猎编译，庄钦永校注，《万国地理全集校注》（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2019）。

³³ 庄钦永，《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2022）。

以十九世纪上半叶传教士中文书刊来说，大部分书刊篇幅简短，惟有郭实猎的译著篇幅最长，也影响最深远。除了美国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06）写过地理篇幅很长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外，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写的中文书刊只有二、三十页，不足以对中国造成强大的冲击。晚清学者魏源（1794-1857）、徐继畲（1795-1873）等著作，大篇幅引用了《万国地理全集》，几乎没有提到其他传教士的著作。“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不喜欢郭实猎，我是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著作在晚清士人学者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才花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写。”郭实猎是近代传教史上极其重要却颇具争议的人物，庄钦永能再次抛开个人喜好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扎实地回到学术议题。

庄钦永对 19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及郭实猎研究的最大突破，是在英国利兹图书馆陆续找到了《万国地理全集》和作者另一本用散文题材写的《大英国统志》。“全世界的学者都在找《万国地理全集》，但都没找到。1985 年我去大英图书馆，目录有这书，但书架上没有，后来写马波可罗到过中国的吴芳思（Frances Wood）写信告诉我，利兹大学有这么一本书，我就去利兹大学买了复印本，这是大突破。”至于郭实猎另一本著作，当时学者都知道《大英国统志》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一本，那是以小说体裁写的。有一年，庄钦永参加香港基督教史会议，看到一条档案资料，郭实猎跟怡和洋行老板说，这本书我写好了，另一本书过些时候才完稿。“如此来说，他应该有写两本，不过目前大家看到的只有一本。后来我在英国利兹图书馆发现《大英国统志》，书名一样但页数不一样，我就冒险一下，花几百块钱，请图书馆职员帮我扫描。收到扫描本，发现它和哈佛燕京图书馆本的内容完全不一样，虽同书名但却是另外一本书。这也是一个突破，学界从来没有人知道郭实猎写过两本同名的书。”

《大英国统治（利兹本）》是世界上第一部以中文书写的英国史地书，《万国地理全集》影响了晚清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郭实猎把英国的“King”翻译成“皇帝”，“Britian”翻译成“大英”，称拿破仑为“皇帝”，词汇翻译看似技术性的操作，这种翻译其实隐藏着外交上的斗争。庄钦永说翻译史必须从语言走向文化转向，才能看出历史政治问题。这促成了他的下一本书——《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刚开始写“大英”考，像大部分学者一样，庄钦永用的是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编的两本《鸦片战争之研究》³⁴档案史料。写到一半，看佐佐木正哉的文书誊录，在英国称呼“大皇帝”、“大清”理应要抬头却没有抬头。庄钦永理解佐佐木正哉誊录不可能按照原件格式抄录，这

³⁴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会很占篇幅；更依据过去看档案的经验，犀利地捕捉到可以从原件的文书格式看出中英两国之间的外交斗争。

词汇的应用，牵涉到翻译史与文化的问题，庄钦永说这得益于他看书看得很广的收获，尤其喜好看西方理论的著作。“我年轻的时候不会想到从两国文书来往的格式发现问题。现在回头看年轻写的东西，当时看的书少，很多问题是看不到的。现在我看的书比较广泛，很多想法不一样，角度也不一样。中国一般还是停留在‘信、雅、达’的翻译理论，直到这十几年才接受西方理论。翻译员一般上有他的政治意识，翻译时不一定照原文直译，我们叫它做叛逆性的翻译。词汇学牵涉翻译、政治、文化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可以写。受西方理论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很早就往这个方向走，后来复旦大学等学者也紧跟着走了。”

庄钦永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是他可以踏足在翻译史、词汇学与传教士研究的原因。回顾年轻及晚年观看历史的经验，庄钦永说“以前念历史系，完全在读历史，很多东西我们不去看。其实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可以结合西方理论、翻译史、词汇学，这样可以像潜水一样看出很多人家没看到的海底景色。美国大学教育有他的好处，英国教育太专，专的时候看不到很多面向。我晚年的时候是走美国教育，我看很多东西，凡是我可能用到的东西我都看他们怎么讲，琢磨怎样应用在研究上，发现很多有趣的问题。”

庄钦永在学术界，早期有“碑文研究者”以及“碑铭专家”的美誉，在华人史研究累积丰厚；后期则专注于传教士研究，跨足在基督教史、汉语新词和翻译史。虽然这些学科表面上看起来是各别的领域，之间并没有共通的地方，后期的研究尤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然若我们回顾他整个学术历程，从他负笈澳洲前投入很多时间阅读甲骨文的英文学术著作，对于文字语言很早以前就有兴趣，实际上他很早就打下进入每个领域的根基和功夫。两个阶段的研究取向以及累积的成果，这当中看似有互通或相互借力的地方。庄钦永一开始觉得华人史研究与传教士没有关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后来也认同说，“对，因为我有这一系列的学术背景，很快可以进入各别的领域，有它的关系，虽然表面上好像不是很明显。”

六、对年轻学人的叮咛³⁵

³⁵亦可参考庄钦永在《学文》2017年第1期刊登的学人自述，题为〈我走上学术的这条不归路〉，有一章分享为学之道（页103-105）。

第一次见面，庄先生就问我一个问题：“若同一天有两场学术会议，一个是名学者演讲，一个是博士生论文汇报会，你会去听谁的？”不待我嗫嚅不定回答，他就说，“很多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都会去听名学者的演讲，我说错，应该去听年轻的，博士生才有新的资料；名学者的著作可以回家自己慢慢读，因为他的学术观点在早年时已定型，不可能有新的东西。”回想过去参加重磅学者演讲未见新意，庄先生一提倒是醍醐浇头，也是学人一种自我提醒与警惕。

笔者是在阅读〈崇文阁非华校考辨〉与〈1819-1844年新加坡的华文学堂〉³⁶这两篇论文，“捕捉”到了庄钦永。前者细读碑文文字，严谨考证，从发现道教敬惜字纸的信仰，推翻陈育崧“崇文阁是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堂”的说法——一个影响学术界三十余年的观点。发现崇文阁敬惜字纸的信仰，庄钦永说是因为看了很多道教的东西，发现陈育崧对崇文阁碑文的诠释不对。“做学问看书要看得广，不单是看你研究的范围，还可以看很多范围以外的知识。为什么我会看《道藏》？中国人的思想受道教的影响很深，鲁迅讲过一句话，你不懂道教你就不懂中国的文化。”研究传教士，他也会看《道藏》。“传教士批评道教，我必须了解他们批评的东西在《道藏》里头是怎么讲的，不能因为传教士这样讲就完全接受。”当然他做学问基本的核心是专注，“我没有其他事情，国大图书馆有整套的《道藏》，偶尔就拿来翻翻。”

庄钦永最后也不忘一提，“哈佛大学值得去，他的图书馆不得了。图书馆开到晚上十一点，我待到晚上十一点，回去睡觉，早上再过去。”访谈结束，笔者不仅对哈佛图书馆向往，庄先生对大英图书馆的描述，亦为神往。“到大英图书馆工作，对我冲击影响一辈子。大英图书馆规模很大，我坐在里头，一旁都是书，心想这辈子我只能看一个角落的资料，我整个人就感觉我这一生不太可能做一个很大的学问，只能在某个领域完成我的研究。即使说我现在研究传教士，只有在我投入到的那个范围我靠得很近，其他东西我都不太懂，我去研讨会人家讲他领域的研究，我可能也不太懂。”对国外图书馆及档案馆“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还要继续追问，那是不是说大英档案馆还有很多档案资料等待被发掘和钻研？一如所期待那样，庄先生肯定地说，“当然啦！到外国大学看他们的藏书，是很惊奇的。”有一次在荷兰莱顿大学，馆员领他到底层书库，看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藏书，又拿出一本书予他看。“他说庄先生，你看这是什么书？馆员是荷兰人，中文很好。结果是什么书，是19世纪80年代在新山出版一本教人家怎么赌博的书。他们很有意识地收这些书，这对社会

³⁶庄钦永，〈1819-1844年新加坡的华文学堂〉，《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165-200、庄钦永，〈崇文阁非华校考辨〉，《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页201-212。

史研究很重要。如果是我们的话，看到这个赌博的书就赶紧丢掉了。他们收藏的人识货，了解学者研究需要的用书。”申请到外国大学图书馆做访问学人有它的条件，让我们有机会一窥馆内不给普通读者阅读的藏书。“这类的书可能放了兩百年没人动，而你是第一个打开它的。”

小结

庄钦永 2002 那年读博，当时 53 岁，自称是一名老学生。他罕见地获得南洋理工大学一份三年半博士在读全额奖学金。2015 年，在《“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新著发布会上，庄钦永自傲地跟郭振羽老师说：“我没有浪费公款！我 50 多岁他还收我做学生，还提供奖学金，这是稀有的。很多人认为训练一个 50 多岁学生，他毕业后就退休，这不是浪费公款吗？”毕业二十余年来，他依旧专注于论文写作，更是踏入学术生命多产的盛年。早年因有一份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及国家图书馆的全职工作，仅能在周末与值夜班的零碎时间拼凑一些笔记式的短文，稍抚对学术的兴趣；自毕业及加入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赚取盆满的阅读与写作时间，能写长篇的论文及专著。晚年的他，对学术更有慢不下来的脚步。疫情期间因无法到新加坡图书馆查阅资料，申请到疫情较为轻微的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访问学人，后因疫情严峻无法出国，于是购买必须参考的重要图书，修订旧稿。“一旦不再写书，学术生命就完了，”这大概是他给自己调拨的警钟。

就时间而言，庄钦永说他有一种“报仇”心理。年轻时，他公馀时间可以做的研究很少，当他年近半百时，觉得要把握时间，安静地多做研究，赔偿年轻时损失的时光，这也是为什么他过着一种几乎隐居的生活。不仅如此，他自觉年纪大了，以后恐怕没有时间再修订旧稿，于是要求自己写的论文要十全十美，每一本书及每一笔能够看到的资料都尽量看。“国大没有的话尽量买，这个钱我必须花。若要通过国大买的话，要等 6 个月到 8 个月的时间，太慢了。现在还好，淘宝便宜，替我省很多钱。”除了因跨学科买的书变多了，还在于他为五年十年后的研究铺路。“我买的书都是这样，看到这本书很重要就先买，不然你到以后可能就忘记了，有这么一本书可以参考，有这么一个题目可以写，所以我都会记录下来。我书多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生命回顾此至，还是忍不住好奇，年届五旬才读博，会不会后悔？想来庄钦永也反复思考过这问题，“我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我应该在国大历史系录取的时候就赶紧念。但我说不可能，”他又替当年的决定辩护道，“我需要花很长时间

看 *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 不可能三、五年完成, 档案馆的工作压力很大。”年轻时的他其实一早就很清楚自己想走学术的路, 但因为个性的关系, 不想麻烦老师为他写一封推荐信。“我的硕士获得考委的好评, 请柳存仁老师跟我写一封信绝对没有问题, 进国大没问题, 念博士也没问题, 因为他是国大的校外考委。我唯一的失败就是我的个性, 这是我对自己的批评。我的个性太直, 能够转弯一点就可以早成功。”

如此看来, 庄钦永的学术历程, 并不是由于学位确认才展开, 学位是随着他多年的研究成果而获得。一般人在念完硕博, 请指导老师写推荐信, 前往各学术单位就职, 才展开学术; 可是庄钦永很早就进入到他研究的领域, 辗转三十年才拿到哲学博士学位, 这是很不一样的过程。尤其他长期在学术圈外, 建立起不受大学体制与条框的束缚, 反而更能在不浮躁的环境里, 自由地在做研究。

【征引文献】

一、中文著作

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

丁荷生、许源泰著，《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上、下册（新加坡：新加坡国大出版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 1-3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1987）。

黄文斌，《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3）。

李爽学，《明清西学六论》（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

【普鲁士】郭实猎编译、庄钦永校注，《万国地理全集校注》（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2019）。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宋旺相著、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

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新竹：清大出版社，2010）。

伟烈亚力著、倪文君译，《1867 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张磊夫著，邹秋筠译，《洛阳大火：公元 23-220 年的后汉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

——，《新甲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

——，《实叻峨槽五虎祠义士新义》（新加坡：南洋学会，1996）。

——，《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民族学研究所资料汇编》第 12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8）。

——，《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编著,《“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2015)。

——,《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2022)。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二、英文著作

Chaudhuri, K. N.,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Mak, L.F.,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5.

Song, O. S.,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Malaya Press, 1967.

Wylie, A.,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 Publication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1867)*.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三、期刊论文

李爽学,〈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我所知道的“龙”字欧译始末〉,《汉学研究通讯》第26卷第4期(2007年11月),页1-11。

阮湧伽,〈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李为经生平事迹补遗——以《厦门光裕堂李氏族谱》为依据〉,《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4卷第1期(2015年6月),页59-70。

——,〈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曾其禄与曾应葵生平事迹补遗〉,《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25期(2020),页65-89。

庄钦永,〈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曾应葵:一个被历史遗忘了三个世纪的人物〉,《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8-19期(2016),页1-44。

——,〈我走上学术的这条不归路〉,丘克威、徐威雄、黄琦旺主编,《学文》2017年第1期(总第11期),页101-105。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我走过的道路(1971-2022)〉,丘克威、徐威雄、黄琦旺主编,《学文》第24期(2023/2),页122-141。

一一, 〈记马六甲青云亭刚发现的两块雍正初年的木牌〉, 张禹东、庄国土主编,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6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页 27-52。

四、专书论文

庄钦永, 〈1819-1844 年新加坡的华文学堂〉, 《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 新加坡青年书局, 2007), 页 165-200。

一一, 〈崇文阁非华校考辨〉, 《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 新加坡青年书局, 2007), 页 201-212。

五、学位论文

Chng, K. Y., *Portents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An (106-125)*. M.A. (Asian Studies)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7.

庄钦永, 《神州域外西湖暗流: 十九世纪上半叶马六甲新加坡中文出版初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博士论文, 2006)。

六、报章

张曦娜: 〈自掏腰包做研究——庄钦永: 不枉此生〉, 《联合早报》(2020年2月24日)。

七、网站

Summary of Joshua Tan's expertise

<https://humanities.ucsc.edu/academics/faculty/index.php?uid=hotan>, 浏览日期: 2024年6月5日。